

道德治理: 调节社会关系的三个视角

张溢木

(北京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44)

摘要: 基于道德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其对社会关系的调节, 可以通过推动社会秩序形成、促进社会力量整合和导向社会思想统一等三个视角来认识。就第一方面而言, 道德治理是将社会关系的矛盾、冲突乃至对立转化为秩序、完善与和谐的过程; 就第二方面而言, 道德治理促使社会关系汇聚成一个有机系统, 从而激发社会的整体性力量, 实现社会系统功能的最优整合; 就第三方面而言, 道德治理承担着引领社会主流思想, 在价值取向多元的背景下保持价值导向一元的功能。

关键词: 道德治理; 调节; 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 B82 - 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6) 04 - 0046 - 04

Moral Governance: Three Perspectives of Adjusting Social Relations

ZHANG Yimu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ole of the moral governance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the regul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can be realized b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al orde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forces, and guiding the social ideology. Firstly, the moral governance is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 into order, perfection and harmony; secondly, the moral governance promotes the social relations to be an organic system, inspiring social integrity strength, and realizing the optimal integration of social system function; thirdly, the moral governance plays a role of leading the social mainstream, and keeping the same values orient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versity in values orientation.

Key words: moral governance; regulation; social relations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次全会公报中, 多次提到“治理”概念, 表现出国家推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拓展治理创新的决心。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提出要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国家治理原则, 进一步充实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在当前的民情、世情、国情下, 基于道德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其对社会关系的调节, 可以通过推动社会秩序形成、促进社会力量整合和导向社会思想统一等三个视角来认识。

收稿日期: 2016 - 01 - 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化转型期的价值冲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编号: 14CZX04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研究”(编号: 12&ZD093)

作者简介: 张溢木(1981 -), 男, 河南遂平人, 哲学博士, 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一、道德治理推动社会秩序形成

一般而言,在任何历史形态下,社会做不到也无法做到对社会关系系统的所有内容进行治理。它所能做的、且最为有效的就是对人外在的社会行为和内在的心理活动进行调控,这往往就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一般是以原则或者规范的形式体现出来,反映着社会稳固的人际关系,体现着社会系统中既定的利益关系,是社会各系统功能得以稳定的客观需要。

人类对社会秩序的理解和认识,是从人对自然的理解和认识开始的。古希腊人认为秩序意味着结构的完美与完善,认为“逻各斯”就是变化着的事物的内在秩序。这些对自然秩序的认识启发了人们对社会秩序的实践与认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人们没有独立的治理手段,还不可能有意识地对生产、生活和人际关系进行调控,一切似乎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和演变。但即使在这个时期,“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仁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 (P1640) 这充分说明风俗习惯与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的关系。“风”是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人们习惯性的行为模式,“俗”是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性的行为模式。风俗合一,人人相染,世代相传,即变为影响和支配人们社会关系各个领域的习惯。风俗习惯并非人们有意为之,但是一经形成,就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使得人们按照其固有的要求去参与社会生活,形成符合现实要求的社会秩序。在风俗习惯治理下的社会,很少会对既有秩序的不满或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在风俗习惯影响的社会里面,违反风俗是不可思议的行为,也是不可能达成的行为。

到了阶级社会,风俗习惯依然在发挥着治理的作用,但是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依照统治阶层的利益建立起相关的治理机制。可以说,在阶级社会,每一种治理机制(包括道德治理在内)都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权益为首要目的,这一目的也就限定了这种治理机制的基本属性。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的每一种道德治理机制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在一定限度内缓和社会矛盾和调节社会关系,在最大程度上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以使这种治理机制所维系的社会能得以存续下去。有学者指出,“从情感上建立秩序的是宗教,从行动上建立秩序的是道德与法制,从思想上建立秩序的是教育”。^[2] (P343) 但是,从历史的实践来看,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治理方法和手段,可以独立地构建起完善的秩序,以达到国家治理的目的。因此,阶级社会里的道德治理往往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恩威并施、刚柔相济,综合各种治理措施和手段,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治理机制,以形成稳固的社会秩序。可见,道德治理的观念和实践,是人类文明社会自古就有的社会历史现象。

可以看出,正是通过道德治理,国家治理中的社会生活才变得文明化和规范化,社会行为才得以被引导、控制和指导。社会学家戈夫曼主张,研究社会秩序就是研究社会组织化的一部分。他认为“当人们按照规则与他人交往时,人们就要使用常规和习俗,或者说,人们会按照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去适应这些规则。……实际行为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动机以及这些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基本原则相联系的各种常规和习俗,共同构成了所谓的社会秩序。”^[3] (P10) 也就是说,每个社会都内在地有着一定程度的组织,也就是社会秩序。在戈夫曼看来,社会秩序的基础在于将社会生活规范化、制度化和习俗化。而道德治理恰恰就是以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以应对和纠正那些偏离社会秩序以及与社会秩序相冲突的行为,进行道德调控以构成社会秩序的过程。

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同时亦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利益差别、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因为利益的勾联引起纷争和对抗,影响和破坏着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并非天然形成,而是需经人为治理形成的客观性关系。这种客观性关系所形成的内在原则与规范,就构成社会关系的内在秩序,并藉由这种秩序外显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纵观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家对道德治理体系的构想,无不是把社会秩序作为人的社会性或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以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秩序的长治久安,甚至是倡导以达到天下大同为其终极目的。从中国古代史来看,礼与儒家法^①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自汉代以后)中道德治理的两种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对社会秩序的寻求,一方面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另一方面塑造着国家阶层秩序。

道德治理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秩序、完善与和谐。但是,矛盾是事物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常态,社会生活的动荡与安定,人际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总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实事求是地看,一个理想的社会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消灭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能使矛盾得到妥善解决或进行有序疏解的社会。也就是说,秩序型社会离不开道德治理,而

^①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法家和儒家是互不相容的。不可否认的是,法治是法家的主要思想。但是法家是以法为治本,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汉代以来的法律,都是以儒为治本、以法为手段的。它维护的是儒家的宗法体制,根本指导思想也是儒家经典。因此才有对古代社会“外儒内法、济之以道”治理方式的概括。

“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法律,在一定范围和限度上还有宗教,其中法律的控制是最根本的”。^{[4][P3]}但毋庸讳言,鉴于法律过于依靠外在的强制力量,能够与其携手进行国家治理建构的正是道德。要想构建有秩序的理想型社会,就必须协调运用法律与道德二者的功能,同时密切结合并充分发挥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作用,从而推动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完善。

二、道德治理促进社会力量整合

社会发展需要有效地组织和整合社会的力量。可以说,社会整合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这同时也是道德治理在国家治理中价值内涵的一个重要指向。

社会整合作为一个多维现象,有着其不同的研究分析视角及概念界定。最早提出社会整合概念的当属西方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涂尔干。他将社会整合等同于“社会团结”。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的整合是主体在平等交往中的有效互动。它意味着集体与个体的协调,意味着成就与贡献的等值。这种整合既包括个人与群体之整合、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整合,也包括人权与人民主权之整合、系统与生活世界之整合、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整合、事实与规范之整合。社会的整合由三个标准共同组成:道德合理性标准(要求一种对于社会世界之秩序的规范性取向),伦理合理性标准(要求一种对良好生活之筹划和需要之诠释的取向),效率及决策的合理性标准(也即经济合理性及技术合理性标准,要求一种对客观世界中的结果和状态的认知性取向)。”^{[5][P394-395]}基于此,哈贝马斯所倡导的社会整合,其实是希望这个社会各行各业秩序井然、运行和谐,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步入并维持一种良性的运行状态。而且其整合的三个共同标准,可以说都是道德治理所要凭藉的基本标准和衡量手段。由此可见,社会整合的最终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且其中最为直接有效的治理手段,即是道德治理。

社会整合既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也是社会保持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先秦时期,如何重建社会秩序、使老百姓从乱世中解脱出来,是诸子百家所提出的社会思想中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德,国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可见,当时的“国”已有“坏基”之虞,迫切需要从“德”的角度对社会进行整合。以儒家思想为例,先秦儒家对如何实现社会整合做了大量阐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礼乐教化实现社会整合。先秦儒家思想认为,当时社会战乱、动荡和无序的总根源在于“礼崩乐坏”。因此,他们强调:一是用礼来引导民众;二是重视“乐”的情感纽带与社会教化功用,极力倡导以礼乐教化为手段实现社会整合。第二,通过协调社会利益实现社会整合。通过平衡各阶层的利益,从而让大家认同社会形态,自觉地遵守和维持社会秩序,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第三,通过道德教化实现社会整合。先秦儒家极为重视道德教化的力量,强调以德化民。一般认为,道德教化可以:一得民心,二淳民风,三遏奸邪,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第四,通过个体修为实现社会整合。儒家思想强调由内而外的个人修为,不仅将“吾日三省吾身”作为修养之道,而且提出了“养心(气)”、“寡欲”等作为内心的修养方法。在先秦儒家思想看来,如果社会中每个成员都以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那么构建整个社会的道德原则与规范体系,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就不是什么难事。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讲,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治理体系是逐步形成的。中国最早的道德治理体系渊源于原始社会的风俗禁忌。并由此为基点,雏形于夏朝,发展于殷商,成熟于西周,转型于春秋,定型于两汉,延续至明清。而且,先秦时期道德治理体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整个过程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依靠自然天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情、群体意识、原始道德与宗教、礼俗来维系社会秩序的原始道德治理;依靠神权、王权与政权的商代道德治理;以礼乐文明相标榜的西周道德治理“事断于法”的春秋战国道德治理。(2)夏代的道德治理具有由传统自然秩序向强制秩序过渡的特征;春秋时期的道德治理具有由礼治向法治过渡的特征。(3)在社会激烈变化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信仰发生危机,“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为法制的高扬创造了条件,法律的道德治理功能空前突出和强化起来。(4)先秦时期的君主专制思想、郡县制、法治、礼治及其相应的伦理道德对当时的道德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战国时期,通过各诸侯国的变法改革,一种新型的道德治理体系最终得以转型成功,并奠定了绵延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道德治理体系的基础。

整合作为道德治理的一个重要形式,既要能“修己”,又要能“安人”。也就是说整合的目的在于使社会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激发社会整体的力量,实现社会功能系统最大的创造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修己”与“安人”,就意味着人要在社会中承担一定的职分或角色,要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和承担既定的道德责任。而且,这一义务的履行和责任的承担,一定不是以享受权利为前提条件的。关于这一点,荀子早有论述。他认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6][P104]}荀子所说的“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力量,就必须有“分”。所谓“分”,作为组织结构、角色结构、职业结构以及国家的管理机构等,是人类生存的保

证,也是使得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是社会组织有序化的标志。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整合,可以使人类的群体力量得到汇集和放大。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整合的基石,其中所追求的亲密型和互利型的人际关系,对于现代社会整合来说,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有了亲密型的人际关系,道德治理在整合社会力量方面才会更加的切实有效。有了互利型的人际关系,就可以通过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的秩序化、规范化和凝聚性。

三、道德治理导向社会思想统一

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带有其时代所赋予的特征。黑格尔认为,哲学仅仅只是能够对其所从属的时代的思想进行把握,而每一个人都是其所属时代的产儿。因此,时代背景的不同,其对应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状况也会不同,而最为重要的是,每个时代应该奠定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从而能够依据人们的思想状况的实际,采取一定的道德治理手段统一思想,形成核心价值理念,这才是道德治理理论的基点。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统一思想并不完全是以统治阶级的思想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而是以社会主导思想为主流,同时允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整个人类社会的思想发展史表明,人的思想统一需要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统一。在中国的先秦时期,老子与孔子是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们二人把先前零星的人文思想上升为理论,老子把人还给自然,孔子把人还给社会,从而奠定了中国历史上人文思想的基础”。^{[7] (P58)}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反映了现实性与理想性之间的空间距离。而这一距离,体现的正是道德治理目标的层次性。道德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以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为基本指导思想。其不仅强调个体的主体精神,而且更为强调社会的完善、群体的和谐对个体完善所具有的治理意义。目标的实现,就必须转化为人们行为的动机,成为激励人们服膺道德治理的精神力量,从而使目标从观念转化为现实。道德治理的目标所涉及的对象多种多样,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两类:一是外部的,包括社会中的伦理关系、伦理秩序、伦理传统和伦理行为,等等。目标在这类对象身上作用的时候,就会涉及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对这些关系的处理,不仅体现主体的价值取向,而且还体现了主体治理行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所在。二是内部的,包括主体的观念、理想等等。由于目标所涉及的对象不同,治理常常表现为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方面。有些学者就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要治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就必须首先改变社会环境;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始终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主张人要反求诸己。而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认为,要完善社会,就必须首先从完善人入手,正人先正己,将“正”作为基准,先正心诚意,然后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不兼善天下难以独善其身,不独善其身也难以兼善天下。只有把改造个体与改造社会,把克制个人欲望与完善社会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从而推进社会关系、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向好的方向发展,达到完善自我、完善他人、完善社会的目的。最终,实现切实有效的道德治理,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 汉书·地理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2] 李伟. 人性系统论[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
- [3] Goffman, E: Relations in Public[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 [4] 宋希仁. 社会伦理学[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7.
- [5] 尤尔根·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 童世骏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6] 国学整理社编. 诸子集成(二)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2006年重印).
- [7] 刘泽华.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责任编辑: 余小江)